

创业维艰毁誉多

——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十八)

(解放军)
胡居成

按周恩来的意见办

周恩来来皖南军部时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陈毅等人商定的几个问题，项英经过三思之后，都同意了，有的已付诸实施。如第六团划归第一支队建制和江南第一、二支队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等问题，叶挺、项英都已分别报呈中共中央和第三战区审批。只有“向东作战”，由于形势急剧变化，项英又有些“五心不定”了。

就在周恩来来到皖南时，蒋介石很快就侦知了他的皖南之行的实际目的，派白崇禧、陈诚以解释汪精卫出走为名，到上饶与顾祝同密商对策。他们分析了整个新四军的现状后，白崇禧得出了一个基本估计：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拿；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据此，他们决定成立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和江南行署，让第三战区前敌指挥部副总指挥冷欣，改任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总指挥顾祝同）和江南行署主任，统领江南军政，把新四军纳入“二游区”，让身在江南的冷欣来禁锢、捆绑陈、粟。项英接到关于成立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和江南行署的通报后，经过分析思考，感到这是蒋介石和顾祝同为制约新四军“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而采取的图谋。为此，他对江南抗战很不放心。

就在此时，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来电，请求批准叶飞第六团东进作战。项英看完电报，当即亲自给陈毅、粟裕回电，让六团停止东进。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东路不是新四军的地盘，被国民党发觉了，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敌情严重，去了会被消灭。

陈毅和叶飞看了项英的回电，象被照头泼

了一瓢冷水，一下子凉了半截。为了“向东作战”，他们动了多少脑筋，费了多少心血啊！

项英的指示不能违拗，而向东作战的确有利于扩大队伍，况已作好准备。陈毅在面临两难境地的时候，经与大家商量，最后决定“先斩后奏”。25岁的叶飞率部出发之后，陈毅命令给项英发电：叶部已提前出发，追之不及……

项英闻之十分焦急，一行几人于6月初二下江南指挥部。见到陈毅、刘炎，项英面露愠色，不满地说：“军部的命令没到，你怎么放六团走啦？也太无组织无纪律了。”陈毅把警卫员泡好的一杯绿茶送到他面前，热情地说：“长途跋涉，辛苦得很，请喝一杯‘纯绿’，解解乏，消消火！”见项英仍然虎着脸，就回到自己的坐椅上，不慌不忙地说：“项副军长，东进的问题，是早就定了的，毛泽东去年5月就有指示；此次，周恩来也和我们反复研究过，你也是同意的，这怎么能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呢？”陈毅吃口茶，看看项英，又恳切地说：“老项啊！执行中央的指示，应该坚决，不折不扣。东进是为了更好、更多地消灭日寇，发展根据地，你总不会反对吧！”项英委屈地说：“上下左右都不理解我，你陈毅也不理解我！你们想打鬼子，难道我项英就不想打鬼子？打鬼子是对的，不打鬼子，人民群众的苦难能解除吗？新四军不就是为了打鬼子才成立的吗？不打鬼子部队能发展，武器能改善吗？唉——”项英长长地叹口气，又接着说：“凡事说得很容易，做起来难啊！不是我反对东进，我只是怕路东敌人太强，叶飞又年轻，对困难估计不足，万一落入敌伪夹击之中，进退维谷，全团覆没怎么办？一个团的兵力，这对我们新四军来说是多么宝贵的力量啊！再说，三战区划定我们的地盘没有东路，我们贸然而

入,和‘忠救军’发生摩擦怎么办?他们兵强马壮,我们势单力薄,万一较量上了,我们势必吃大亏不说,还会舌头伸给别人咬,三战区反说我们不是,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

陈毅觉得项英说的确实也是心里话。但项英面对既成的事实,也只好等等看。

几天之后,在项英、陈毅急切的等待中,传来了六团出师告捷的消息,他们这才松了口气。叶飞、吴焜、何克希等人率领队伍东进作战,不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且未与“忠救军”发生摩擦,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项英进一步认识到指挥员的军政素质是部队作战能否获胜的关键,因此,他决心分期分批抽调部队和军部机关以及直属队营、团领导干部,成立“上干队”进行培训,由政治部直接领导,通过总结经验,加强阶级教育、民族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高素质,以便迎接新的斗争形势,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为今后部队的大发展准备骨干,打下基础。

项英对新四军干部的培训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他在1938年3月16日给中共长江局的报告《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中就强调:“干部决定一切。提高干部的素质,就是坚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基本条件。”这次,项英不顾一些领导人怕主要干部调去学习影响部队发展的意见,决定办“上干队”。第一期抽调了第一支队第一团参谋长张藩、第二支队第三团政治处主任钟国楚、第三支队第五团政委曾昭铭、第六团参谋长黄元庆、军部机要科长杨宝山、军部特务营副营长李林等30多名营、团干部参加学习,编为4个班,学期为6个月。

“上干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发展史)、毛泽东著作、我军优良传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军事、文化教育等。除文化课外,没有设专职教员。各课教员都由军部领导和军政治部、司令部一些部、处长担任。

项英担任的主要课程是:保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军史、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

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教导总队总教育主任薛暮桥等领导人,也都分别担任了上干队的课程。袁国平主讲政治工作和形势教育课。周子昆主讲军事课。薛暮桥主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

叶挺当时在江北指挥四支队东进,一次回军部开会,也特地去上干队作了讲演,他通过对抗战必胜的论述,鼓励学员抓紧时间学习,准备上前线。

7月1日,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去“上干队”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并检查文化队与上干队演唱《新四军军歌》:“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上午11时,项英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宣告《新四军军歌》正式诞生。他立在队前,兴奋地大声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唱,唱出我们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唱出我们新四军的英雄形象!”

“上干队”共办两期,有70多人受训,这对进一步统一新四军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军事、政治、文化素养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在1939年中秋节这天,在皖南云岭罗里村一座旧式庄院的普通套房里,项英与军部后方医院19岁的护士长尤娴举行了婚礼。说来这事也得感谢作皖南之行的周恩来呢!

组建新四军时,项英怕蹲了几年山沟的老战士下山后忙于结婚,涣散军心,影响斗志,所以作出规定:新四军干部战士不分老少,不分职位高低,一律不准恋爱结婚。

项英的这条规定,不久就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反,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的干部,更是不满,发了不少牢骚,说了不少怪话,有的当着项英的面开玩笑说:“项副军长,你这条规定,不是使我们绝了后吗?我们死了,谁来接班啊!”项英也半开玩笑地反问:“是抗战重要,还是你找老婆生孩子重要?抗战胜利再说吧!”直到周恩来到皖南军部来,听了不少干部反映,才找项英对规定作了修改。周恩来对项英、袁国平说:“革命不是为了打光棍,打光棍并不表示革命坚决,不问年龄和条件,一刀切,一个不结婚不行。”研究规定了个“二八五团”制,即28岁、5年党龄、团的干部可以结婚。

这个规定一出,最能关心体贴人的“邓婆婆”邓子恢就张罗着给项英物色对象。项英原来的妻子张亮在1935年从苏区转移时与队伍失散后被捕,实现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被保出狱,在投奔延安途中失踪。而项英听说与张亮一同转移的瞿秋白、何叔衡牺牲了,便以为妻子也已遇难,心中十分悲痛。几年了,他一直孑然一身,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四军的建设上。

有一天，邓子恢同项英到一团视察，骑着马边走边谈。邓子恢还是从张亮谈起。他说：“我们新四军打鬼子全国出了名，张亮要是还在世的话，也该找来了。”项英说：“是啊，我也常这么想。看来可能是不在了。”沉默了一会儿，邓子恢说：“副军长，你都40出头的人了，再找一个成家吧！”他见项英默不作声，又进一步说：“军部虽然放宽规定，允许够条件的干部结婚，但是，你副军长不结婚，其他人也不好意思打报告结婚啊！”

项英笑笑说：“哪里还不好意思，他们在周恩来那里都把我告了！特别是那个陈爽子，话最多，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啦，当兵不是出家当和尚啦，甚至影响干部安心部队啦，等等，结果把恩来给说服了。”

邓子恢拉拉缰绳，向项英靠近些说：“他呀，看上了战地服务团的‘小白菜’。”

“是吗？”项英转过脸，惊奇地朝邓子恢说，“他们的年龄可是相差很大啊！”

“年龄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看是不是情投意合。”

“说的也是。”项英随口回答一句，不再言语，让马慢慢地走着，好象在想些什么。

邓子恢又试探着问：“军部医院、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好几百女同志，不知副军长看上哪个？”

“没有，没有。”项英红着脸连忙解释，“工作忙得喘不过气来，那有闲心想这个问题；再说过去的规定是我提出的，我要带头执行啊！”

邓子恢说：“我给项副军长物色一个怎样？”

“谁啊？”很少开玩笑的项英笑道，“‘邓婆婆’请示下！”

“后方医院的护士长尤娴怎样？”邓子恢看着项英问。

“她可是比我小22岁啊！”提到尤娴，项英显然很高兴。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你们互相通报了年龄？”邓子恢故意跟项英开玩笑。

“莫瞎说，没有的事。上次我陪史沫特莱去小河口，听她对史沫特莱说的。”项英急忙解释。

“大几岁没关系。陈毅也比张茜年龄大哩。”邓子恢说，“那我就当‘红娘’啦？”

项英没有说同意，但也没有反对，默认了。从一团回军部，邓子恢就去了小河口。傍

晚，邓子恢约尤娴散步。他们沿着一条小路向空旷的田野里边走边谈，他关切地问她的籍贯、家庭、学习、工作情况，最后问她有没有对象？尤娴顿时满脸绯红，低着头说：“我还小呢！”

邓子恢早预料到尤娴要这么说，就笑着说：“不能说小了，都19岁了嘛！我们福建龙岩姑娘，一般16岁就嫁人了。要是没有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位怎样？你看项副军长怎么样？都41岁的人了，工作又忙，没人照顾可不行啊！”

尤娴不好意思地说：“项副军长这人很好，正派，平易近人，只是——他家里有妻子吗？”

于是，邓子恢就把张亮突围失踪的事向尤娴作了介绍。尤娴也相信张亮是不在人世了。但她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感到项英职务太高，自己配不上。邓子恢笑道：“这就你放心好了，职务你没有他高，但文化、学历你比他高呀！项副军长出身店员家庭，10岁丧父，兄妹二人靠母亲纺绣为生。他读过4年小学，15岁就到工厂当学徒，是个苦出身。你呢，高级护士学校毕业，又懂英语，将来是个好助手哩！”邓子恢还告诉尤娴，项副军长第一次见到她，就留下好印象，只是碍于军里的规定，才没有主动给你写信。尤娴回忆项英找她谈话，要她陪伴史沫特莱的亲切情景，当时只感到他没有首长架子，态度和蔼可亲，现在想想，对自己确实不一般。

尤娴的顾虑解除了。

不久，尤娴就收到留守处主任兼军医处协理员姬鹏飞从军部带来的项英的信。信中说：你我关系的方式，虽是“邓婆婆”介绍的，但彼此相爱是由同志关系、政治条件、工作利益、双方前途和共同需要等诸因素而自然促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会逐渐浓厚起来。但无产阶级的爱，不同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爱，首先是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花前月下不是卿卿我我，而是花前谈心，月下互勉，为了工作，为了抗日，共同在党的领导下前进！

经过几个月的通信和多次相谈，在邓子恢、袁国平等人的催促下，项英和尤娴商定：中秋节结婚。

项英结过婚不久，袁国平与邱一涵、周子昆与何志友、曾山与邓六金、张云逸与韩碧、陈毅与张茜、李一氓与王仪也都相继结婚。

（责编 启元）